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美] 约·贝·福斯特 著

生态革命



——与地球和平相处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生态革命

——与地球和平相处

[美] 约·贝·福斯特 著

刘仁胜 李晶 董慧 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美)福斯特 著;刘仁胜 李晶 董慧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

书名原文: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ISBN 978-7-01-014419-1

I. ①生… II. ①福…②刘…③李…④董… III. ①生态平衡-研究
IV. ①Q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5382号



生态革命
SHENGTAI GEMING
——与地球和平相处

[美]约·贝·福斯特 著 刘仁胜 李晶 董慧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0.5

字数:350千字 印数:0,001-2,000册

ISBN 978-7-01-014419-1 定价:65.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

主 编：俞吾金

副 主 编：陈学明 吴晓明 张庆熊

执行编委：鲁 路 王凤才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凤才 王金林 王新生 邓安庆

冯 平 孙小玲 孙向晨 张双利

张庆熊 汪行福 陈学明 邹诗鹏

吴晓明 吴新文 吴 猛 汪堂家

周 凡 罗亚玲 林 晖 俞吾金

莫伟民 鲁 路 鲁绍臣 魏洪钟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

序 言



1985年,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室,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1999年,在这个教研室的基础上,吸收了外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部分成员,成立了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0年,该中心被评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小基地”)。2004年,在“小基地”的基础上建立的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基地又被评为“985”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大基地”)。

自大基地建立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能编辑、出版一套译丛。尽管国内多家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合作,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推出了一批译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们认为,这些已出版的译丛仍然存在以下的不足之处:

一是学科分类的束缚。从内容上看,已经出版的译丛,或者是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或者是关于国外其他思潮的。其实,无论是国外学者的思想,还是国外思潮的内容,都超越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国外其

他思潮”的简单两分。比如,萨特、哈贝马斯、德里达等著名学者,既是当代国外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又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标志性人物。又如,现象学、精神分析、分析哲学、存在主义、诠释学、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等国外思潮,在其发展中无不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元素。我们之所以把自己打算出版的译丛命名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就是希望打破学科分类的壁垒,以更灵活的方式,把整个国外思潮中富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论著译介进来。

二是成果形式的限制。在通常的情况下,译丛是由译著构成的。众所周知,不但著作的出版会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而且著作的翻译也会有一个较长的周期,从而使译著提供的信息相对滞后。而我们希望本译丛能够打破成果形式上的限制,对重要的译著和译文兼收并蓄,我们甚至希望把翻译的重心放到译文上,因为论文通常包含着更为前沿的信息,翻译的周期相对也比较短,更易对读者的思想产生启发。

三是论著选择的盲点。人所共知,不同的译丛体现出选家的不同眼光。如果说,不同选家的眼光在某些重要的论著上会形成重叠,那么,同样也会出现一些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盲点。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编纂的译丛,努力清除这些“盲点”,使读者对整个国外思潮有全面的了解。

在某种意义上,编纂译丛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杨绛先生认为,翻译中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像抓虱子一样,是抓不完的。然而,反过来说,这并不能成为降低译文质量的理由。我们殷切地希望,通过译丛编委会、译者和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积极把好质量关,使本译丛成为译丛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当然,本译丛所选著述的观点并不代表编委会、译者和出版社的观点,只是想为读者提供一份可资借鉴的研究资料。

目 录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序言	1
序 言	1
导论:生态革命	5

第一部分 全球危机

第一章 生态破坏	31
第二章 生态:危急时刻	44
第三章 蕾切尔·卡逊的生态批判	54
第四章 石油峰值与能源帝国主义	70
第五章 五角大楼与气候变化	90
第六章 杰文斯悖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环境与技术	103
第七章 全球大挫败:全球环境改革的失败	110

第二部分 马克思的生态学

第八章 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	123
第九章 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环境社会学的古典理论 基础	142

第十章 资本主义与生态学:矛盾的本质	180
第十一章 《共产党宣言》与环境	192
第十二章 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诅咒	211

第三部分 生态与革命

第十三章 展望生态革命	229
第十四章 生态学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240
Notes	252
INDEX	301
译后记	320

序 言

我在本书中的逻辑前提即在于,我们在人类与地球的关系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现在所有人都希望这种关系的未来,要么是革命性的,要么它就是虚惊一场。在《与地球和平相处》——本书将其作为副标题——一书中,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写道:“如果环境遭到污染,经济出现疾病,那么,造成以上两者的病毒均可在生产制度中找到。”¹今天,环境和经济的两种疾病——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可以发现的这种共同原因的事实——已经毋庸置疑。正是这种原因才使生态革命成为必然。

《生态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提供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曾经称谓的“希望之旅的智谋”。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样一种旅行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一直致力于理性地面对现实。正如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希望的原理》中所解释的那样,它是在“具体的乌托邦”中“最冷静的侦探”和最狂热的信仰者。

诚然,目前驱使着我们的与其说是希望还不如说是必要。正如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其《佛祖寓言:燃烧的房子》一诗中所解释的那样,当火苗舔着房梁,烧焦我们的眉毛,并考虑建造一栋新房子是否可能的时候,我们无法安坐在这栋房子当中。我们必须抛弃旧有建筑物,并努力建造一座新建筑。²

[7]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针对本书所提供的一种革命性环境观,一

种常见的批评意见却认为它缺少一种希望；因为，它需要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³然而，那种认为人类的历史之旅已经结束，而且目前主流的生产方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在面临世界生态系统和人类文明即将崩溃、人类自身能否继续存在尚存疑问的时候——的观点只能够引起绝望，因为，它没有提供一种走出当今封闭循环的可行之路。

相反，为生态革命而进行的努力奋斗则坚定地植根于“希望的原则”当中。在这里，人类的自由发展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进都仅仅是开始。整个人类文化演进的历史，可以被看作一种不时被打断的平衡，诸多革命则在关键时刻通向新型社会组织。我们不能确定，目前根本性地变革人类与地球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自我关系）的尝试一定能够获得成功。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数亿——可能数十亿——的人们，将在我们当今世纪为这样一种结果而努力奋斗。

《生态革命》的写作历时 12 年之久。所有章节——除了导论之外——都基于以前所发表的诸多文章。但是，每一章节都因为本书而做过改编，而且多数章节都已经做过根本性修订。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只是为了要产生一种完整而连贯的论证。某些关键主题和分析工具，比如马克思的新陈代谢^①断裂概念和杰文斯（Jevons）悖论，都会在后面的整个篇章中反复出现。这些内容应该被看作分析过程中的主要连接环节，论证了我们为何以及如何应该而且能够为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生态和社会秩序而努力奋斗。

我很幸运，能够在我的生态研究——本书所阐述——的早期阶段就认识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他到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进行环境

^① 德文的“Stoffwechsel”对应英文的“metabolism”或者“material exchange”，即“新陈代谢”或者“物质变换”；故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根据社会科学属性和自然科学属性的大致区别，将德文的“Stoffwechsel”（或者英文的“metabolism”）分别译为“物质变换”和“新陈代谢”。本书英语作者在使用“metabolism”的时候，均遵照其“新陈代谢”的专业术语本意，因此，译者将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对应英文“metabolism”的地方统一译为“新陈代谢”，只有在出现“material exchange”的地方才译为“物质变换”。——译者注

社会学方面的硕士研究,从那时起,我就与他紧密合作。布雷特现在已经是北卡罗纳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我们共同撰写了本书的四章内容,其标题如下:第二章,“生态:危急时刻”;第三章,“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生态批判”;^[8]第六章,“杰文斯悖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环境与技术”;以及第12章,“生态帝国主义”。他在本书中的每一个方面都给予我帮助。我在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和朋友理查德·约克(Richard York),以及布雷特和我本人,共同撰写了第二章;他在生态学、进化论和资本主义的诸多问题上,都给我的思想留下了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影响。本书中的许多内容来自于我与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同成果。保罗的《马克思与自然》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都是该领域中的精华读物,可以被看作本书以及我之前的其他几本生态著作,如《脆弱的星球》、《马克思的生态学》和《生态学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姊妹篇。

还有一些人也对本书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每月评论》编辑部,我非常荣幸地能够从一个由亲密朋友所组成的天才团队中获取无价的帮助和灵感:迈克尔·耶茨(Michael Yates),现在是《每月评论》出版社的社长;约翰·梅吉(John Mage)、约翰·西蒙(John Simon)、克劳德·密苏凯维奇(Claude Misukiewicz)、马丁·帕迪奥(Martin Paddio)、弗瑞德·麦格多夫(Fred Magdoff)、古井佳江(Yoshie Furuhashi)、维克托·沃利斯(Victor Wallis),以及最近的斯科特·博尔歇特(Scott Borchert)。特别是约翰·梅吉简直就是布洛赫所说的“最冷静的侦探”,从一开始,他的尖锐批评和不知疲倦的支持都使我获益颇丰。

在撰写本书期间,我也从一起工作的俄勒冈大学研究生小组中获益匪浅,他(她)们是丽贝卡·克劳森(Rebecca Clausen)、汉娜·霍勒曼(Hannah Holleman)、赖安·乔娜(Ryan Jonna)、菲利普·曼克斯(Philip Mancus),以及斯蒂凡诺·朗格(Stefano Longo)。他(她)们提供了诸多新问题和新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汉娜和乔娜,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直接

帮助。

在我出国期间,诸多朋友和同仁都提供了他们的帮助。其中,我要特别感谢南非——第七章中介绍——的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英格兰——第八章中介绍——的彼得·狄更斯(Peter Dickens),巴西——第一章中介绍——的尼尔多·欧里克斯(Nildo Ouriques)和卡特琳娜·格韦尔(Catarina Gewehr),以及澳大利亚——第14章中首先介绍——的彼得·波义耳(Peter Boyle)、戴夫·霍姆斯(Dave Holmes)、特里·汤森德(Terry Townsend)和阿里尔·莎雷(Ariel Salleh)。

在过去的35年当中,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通过其坚定的友谊、支持及其提供的实例,深刻地影响了我所有的政治和学术追求。

最后,本书中所弥漫的关于希望的革命之旅的感觉,已经进入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主要应归功于卡丽·安·瑙莫夫(Carrie Ann Naumoff)。将《生态革命》献给卡丽·安。作为工人斗争的捍卫者,以及作为教师、共同体组织者和家庭成员,她在传奇色彩的植树集体“镐锄(Hoedads)”组织中的终生奋斗,都体现出对可持续性、共同体和平等的

[10] 责任和义务——构成了我在本书中所称之为“生态革命”的本质内容。

导论：生态革命

我们需要一个“足够”的观念。

——奈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平衡中的生命》¹

我们生活于这样一个时期,即现实和理性的冲突要求我们追问诸多有关世界末日的问题:这个星球正面临着一种非常严重的生态崩溃吗?文明正处在深渊的边缘吗?人类物种自身的生存存在疑问吗?今天,这些必要的和理性的问题之所以提出来,正是因为科学研究正在不断地告诉我们: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即使持续一个世纪,地球及其居住者的结果将是这个世界的崩溃——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实际上,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中,也许仅有十年时间,随着西南极洲和格陵兰冰原的快速消融、北极海冰的消失、冻土地带的融化以及喜马拉雅和其他地方冰川的永远消失,生态即可能到达临界点——在气候和生态系统中催生巨大变化,将无数人和不计其数的物种置于危险当中。因此,生态革命——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大规模的、快速的变革——的必要性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同。

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在其《诸多生态革命》一书中,将“诸多生态革命”定义为“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之间关系的诸多重大变革。”^[11]它们源于社会生产方式与其生态系统,以及其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之间发展出来的诸多变化、紧张和矛盾。”²当今社会无疑在其生产方式和

生态体制方面正面临这样一种重大变革,以应对地球的当前危机。

然而,这只是将我们引向另外一个问题:何种生态革命?当然有无数种答案。但是,本书的一个核心前提是:这些革命可以被划分为两种主要途径。一种最好被描述为生态工业革命——一种新型的工业革命,几乎完全通过技术手段,诸如更加有效的能源系统,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基础。³这种绿色工业革命经常被其支持者们理解为某种形式的“生态现代化”,诸多富裕国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将发展生态创新作为新的市场机遇。其中,诸如提高能源效率等没有限制的技术创新被认为非常重要。但是,在这种景象当中,除去技术之外,社会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将没有任何变化。致力于没有限制的资本积累和将人为制造的私欲置于个人与社会需求之上的秩序并没有改变。实际上,“变绿”经常被作为一种大规模地扩大商品生产和销售机会的一种手段,用于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为了经济增长和统治而展开的竞赛当中。因此,它依然停留在当前社会秩序中主要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者”假设之中。⁴

第二条途径——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这种——是一种更加根本的生态—社会革命,它吸收必要的替代技术,但是强调必须变革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根植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当中的社会结构。这只有通过一种可持续的人类发展过程才能够实现。这意味着要果断地走向平等和公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式,从而打破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逻辑。目标不是进一步扩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裂缝隙——当前世界经济以此为特征——而是恢复到更加有机和可持续的社会—生态关系。这些变革包括基于文化革命以及经济和社会革命基础之上的文明转型。

[12]

最后,这种途径有待解决的问题是:需要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或者当前历史文明的破坏性阶段的方式,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大厦一砖一瓦地逐渐替代它。虽然这必然包括诸多根本性的技术变革,但是,这里所强调的则是更加广泛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因为这些——而不是

技术——才是问题所在。正如美国迄今为止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社会生态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强调的那样,我们面临着“技术与人类发展”问题,而后者代表着人类及其更加广泛的诸多社会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⁵

这种更加社会性的——不同于只是工业性的——途径构成了本书所论证的通向生态革命的唯一真正途径。试图仅仅通过与基本社会关系相分离的技术的、工业的或者“自由市场”的手段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是没有效果的。今天,生态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明进程已经到达终点。虽然对于诸多早期生产形式而言代表着很大进步,但是,资本积累制度——包括因为这种积累制度而将诸多社会成本不受限制地外化于贫穷的欠发达国家和整个星球——已经逐渐成为人类发展、甚至人类(以及多数“高级”物种)生存的一种障碍。

既然生态问题的可怕本质现在已经被非常广泛地——即便不是普遍地——认知,那么,这两种对立的生态革命途径之间的冲突,现在就可以被看作当今环境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中心问题。这不是一个关于技术和非技术、工业主义和非工业主义的争论。相反,这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容纳诸多必要的生态变革的争论——或者,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综合了诸多重大事由(经济的、社会的以及环境的)的制度,它是否最终已经达到其极限。一种真正的生态和社会革命——根据马克思关于革命形势的一般概念——的理由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已经发展出来的“所有生产力”,对于业已存在的生产方式而言已经属于“充足的”,并且与可持续性相兼容,因而需要对社会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进行革命性变革。⁶ [13]

绿色工业革命

正如前文所提,认识到我们受到生态崩溃甚至文明消亡的威胁,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对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而言,极端的全球变暖可能

并不是一种生存危机；”马克·林纳斯(Mark Lynas)在其《6度》中写道：“但是,对于非常不幸而居住在一个快速变暖的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它确实将成为一种生存危机,而且这种形势确实已经足够糟糕了。”⁷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正是“基准情景(business-as-usual)”——亦即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应该因为这种迅速加快的全球灾难而受到谴责。然而,我们却被横跨左右政治分野的诸多思想家们引导着去相信:这个问题并不会超越该制度所严密构想出来的诸多技术特征。增加效率成为众所周知的免费午餐——容许经济永不停息地以几何级速度增长,但却不扩大对地球的剥削。

经常伴随着这个问题的混乱思想状态,可以通过引用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的一段文字而加以验证。虽然认识到这个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并将这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扩张;但是,克里斯蒂安却评述说: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创新的动力,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依赖日益增长的生产和销售。增长与可持续性是不可兼容的吗?答案并不明确,但是有诸多理由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适当地设法与至少向可持续性转变的某些早期阶段共存。一种理由是,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利润增长多于生产增长——而利润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其中有些途径与可持续性经济相协调……在资本主义和可持续性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矛盾。⁸

[14]

这些观点认为,可持续性——至少在其早期阶段——可能存在于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范围之内。然而,它们避开了主要问题,歪曲了数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模棱两可地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适当地设法与至少向可持续性转变的某些早期阶段共存”,就是回避了如下问题,即它作为一种制度对于如此一种转变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障碍,以及它实